

纪念改革开放暨恢复高考 40 年 院士忆高考 19

本报与湖南大学党委宣传部、湖南大学出版社联合推出

如果没有高考,我会当一名赤脚大夫

■武强

我出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一个小县城,父母都从事医疗工作,父亲对我的职业规划是也成为一名医生,高中时我便自学了部分医学知识。

当时的人,人生轨迹都一样。1977年高中毕业,我跟所有同龄人一样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”。如果没有意外,我会在公社的农村医院成为一名“赤脚大夫”。

然而,在我下乡没两个月,便传来了恢复高考的消息,我仅仅复习了20多天就上了考场。高考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,让我学习了艰苦的水文地质专业。水文地质学虽然是研究与人类生存密切相关的地下水资源与环境,而“山水防控”等内容的学科,但与医学一样,对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与水平意义同样重大,我认为所学专业同样意义非凡。

医生世家的意外

我的父亲是县医院的一名中医,母亲是妇产科医生。父母的职业对我影响很大,尤其是他们精益求精的工作精神、忘我的工作态度以及救死扶伤的高尚品德,给我童年时期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,也让我对这个职业很有好感。父母也希望我今后能从事医学工作,考医学院。后来,我的哥哥和妹妹先后都从事了医疗相关工作。

高二时,我在父亲的指导下开始比较系统地学习中医,看了很多中医方面的书籍。中医里的很多技能看似简单却非常讲究,当时我每天早晨都要背一会儿经络学的口诀。“脉为血脉百骸通,大会之寸守口中,掌上高骨名关上,关子前后寸尺分”,这些口诀我至今还能熟背出来。此外,我还背过二三百种中药的药理功能和相关中药汤剂等知识。

高中毕业后我还学会了注射打针,我打的第一针就在我父亲身上。当时虽然很害怕,但在父亲的鼓励和指导下,我还是成功地掌握了注射打针的部位和打法等相关技巧。

我上小学的时候,见识过中学生“文革”期间出去串联游行,等到我上中学时,游行串联的时期已经过去了。所以我很幸运,虽然经历了“文革”,但是一直没有停过课。不过当时大家都不怎么重视上课,虽然老师讲课还是比较认真,但班上没有学习氛围。我属于上课认真听课,但课后从来不看书不做作业不复习的那种孩子,有时间就阅读医学方面的相关书籍。

更多的课余时间我用来参加体育锻炼,特别是打篮球。每天下午放学后我都要跟同学一起打篮球,体育锻炼也给我后期健康的体魄打下了重要基础。“文革”时期,群众性体育运动开展得比较好,我们地区每年都举行各县区中学生篮球赛,我高中三年都代表县中学生篮球队参加地区比赛。

1977年6月我高中毕业,当时还没有任何恢复高考的迹象和信息,我就按照一般程序“上山下乡”了。当时,上大学是靠推荐的。因此,父亲给我的规划是先下乡,当一名农村医院的赤脚大夫,然后通过推荐上医学院,最终当一名医生。

等到所有手续办完,1977年10月初我才正式下乡,主要工作是给菜地浇水和收割等。结果,还没来得及施展我当医生的抱负,11月中旬就传出了恢复高考的消息。等到11月底,官方文件正式发出,停滞了十年的高考终于恢复了!我也成为了中国最后一批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。

“老武家录取通知书来啦!”

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,父亲赶紧通知我回家看书。当时,我们县中学办起了高考培训班,



武强

1959年出生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,1977年12月参加高考。1982年1月毕业于河北地质学院,1991年6月博士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(北京)。现为矿业大学(北京)教授,博士生导师,国家煤矿安全防治工程研究中心主任,国际矿山水协会(IMWA)副主席,国际矿山水协会(IMWA)中国国家委员会主席,国家安全生产专家组成员,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“水与地质”专家组组长,《Mine Water and the Environment》副主编,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,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技术委员会委员,中国煤炭学会和中国地质学会常务理事等职。2015年12月7日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。

大家都去参加,复习劲头十足。但是时间很短,12月中旬就考试了,也就复习了二十来天。所以,最后的高考成绩其实还是主要靠以前的沉淀积累,突击复习的作用有限。

父亲对我高考非常重视,前一天甚至帮我削好了铅笔。我记得父亲连我上小学都没送过,高考的第一天,他把我送去了考场,我至今印象深刻。我因为家在县城,交通还比较方便,有的考生从农村坐三轮车来的,还有走几十里路来的,什么样的都有。

当年的高考是各省各自出题,各自确定分数线。我记得考了4门课:数学、语文、政治和理化。物理化学是一张卷子上,各占50%的分数,没有考英语,我们县城也没有开过英语课。考完之后,自我感觉理化考得还不错。

报志愿时我清一色报的医学院,从北京医学院报到内蒙古医学院,但当时大家均要在最后填写服从分配。结果怎么也没想到,最后把我录取到自治区外的河北地质学院。因为当时内蒙古高考录取顺序是按照成绩先区内区外,估计我当时报考北京医学院的分数不够,但在内蒙古医学院录取之前,河北地质学院已优先录取了。就这样,我跟医学专业失之交臂。

拿到录取通知书,虽然父亲觉得没有被医学院录取比较遗憾,但也为我能考上大学感到高兴。恢复高考第一年,570多万考生只录取了27万,录取率不到5%。而且应届毕业生只占很小的比例,大部分都是之前十几年攒下来的考生。我们县高中只有包括我在内两个应届毕业生考上了本科大学。当时我拿着录取通知书就去县一中找老师,老师特别开心,说这是我们中学收到的第一份录取通知书。

录取通知书是邮递员送到家里的。那几天,邮递员成了我们县城最受瞩目的人,他一来大家都出来看,看到他到谁家就知道谁家可能有喜事了。邮递员看到是录取通知书,大老远就喊上了:“老武家录取通知书来啦!”周围邻居都非常高兴,我们这十几年没有出过大学生了。

班长大我一轮

1978年3月开学了,我一个人背着行李来到了河北宣化,开始了大学生活。

我们班上应届毕业生只有两人,当时大家年龄悬殊很大。比如我的班长跟我一个属相,年龄正好比我大一轮,上学时他已经有3个孩子,毕业时4个孩子。他在高考前参军5年,又干了5年大队支书,阅历丰富,所以当之无愧成为我们的老大哥、老班长。今年,退休的老班长的孙子也参加了高考,成绩很不错,老班长专门

电话咨询我他孙子的报考学校和专业等。

我们那一届很特殊,应届毕业生非常少,大多数同学都走过了“上山下乡”的岁月,有些人耽误了很多年,所以特别珍惜学习机会,特别努力。在这些“老的”带动下,我们这些“小的”学习劲头也很足,我们班28个人几乎每晚自习到10点回宿舍。

当时每个学生都有一个坐垫,主要是用来占座用的。那时候在大阶梯教室上课,同学们每天早上起床后先去占座,然后再去锻炼、吃饭,大家都想抢前面的座位,看黑板清晰,听老师讲课清楚。

我们的老备课讲课都非常认真,之前几年大学都是招收工农兵学员,水平参差不齐,不好讲课。到了77级入学,老师们都非常重视,把自己多年积累的真才实学都拿出来了。

对我来说,学习上最大的困难是英语。入学之后英语分快慢班,测试的第一题就是写出英语26个字母,我居然没写全,因为从前压根没学过。

我们专业108个人,最后分了一个快班,三个慢班,当时班上除了大城市的一些同学,其他同学英语都不是太好。我们的英语老师很多是学俄语转行的,也有一些俄语口音,但是他们非常认真,从26个字母开始教我们。我的同桌是北京考生,他一人学就学到了新概念英语第二册,对我英语学习帮助很大。

我的英语是从背单词、阅读开始学习的,因为当时没有听力材料。直到大学毕业我买了一台收音机,才开始听美国之音每天晚上的慢速英语节目和一些英语磁带等,才能保证每天能听到英语。再后来中央电视台开



武强在作报告

始有英语节目,我们一到时间就看。经过多年艰苦的努力,加上后来出国学习深造,才终于把英文补上来了。

苦中作乐的科研生涯

每次从家里去学校,我都背着母亲给我做的一瓶肉酱。

当时食堂没有选择,每天几乎就是吃一个菜加窝窝头,整个学校1000多人吃的都一样。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烧茄子加窝窝头,因为烧茄子黑乎乎的,窝窝头也黑乎乎的,黑到了一块儿,大学4年吃得最多的就是这个。只有过新年的时候才能每人发一只烧鸡,改善一下生活。因为菜里没有什么油水,母亲就给我做了肉酱,每次开学带上一大瓶,打菜的时候往饭盒里放一勺,拌着茄子吃,滋味就好多了。

我们班有一个同学是带着工资上学的,他经常礼拜天去北京买挂面。当时只有北京能拿粮票买挂面,我们在宣化根本见不到,细粮只有40%,剩下大多数都是各种粗粮杂粮。每次打完球,我们去食堂吃黑乎乎的茄子和窝窝头,而这个同学就回宿舍用煤油炉煮挂面吃,当时我们看着都很羡慕。他还有六必居的酱菜,切了给大家每人发一块,大家都感觉特别美味。现在人觉得挂面咸菜有什么好吃的,但在当时都是难得吃到的美味,好在当时年轻,倒也不觉得艰苦。

从大学开始,我的水文地质生涯就开始了。当时,我对地质一无所知,只知道是一个比较艰苦的专业。上大学后才体会到,搞地质,野外工作是必需的,调查、跑路线、勘探、打钻、抽水试验、取水样等等,从本科就开始锻炼。1982年元月我毕业之后留校任教,因为当时各所高校都缺少师资队伍,77级毕业生留校较多。

1985年9月,我到了中国地质大学(北京)开始攻读硕士,博士期间转向矿床水文地质学的研究,解决采矿工程活动中地下水防治和资源化利用等难题。我的导师是著名的田开铭教授,他是我国矿床水文地质学的奠基人之一。我也成为我国矿床水文地质学的第一位博士毕业生。

1991年6月我博士毕业之后,恰逢中国矿业大学(北京)研究生院田宝霖教授开设矿床水文地质专业,经田开铭老师推荐,我就来到了中国矿业大学(北京)从事博士后研究,从此正式开始了我最艰苦且危险的矿床水文地质研究和教学工作。这两位田老师对我个人成长都具有重要影响,衷心感谢他们。

虽然我没有学成医,从事了地质工作,但母亲一直很支持我。煤炭是中国的主体能源,能够解决中国主体能源在开发过程中的安全、绿色问题和水资源综合利用问题贡献力量,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。

(本报记者陈欢欢采访整理)

剧场

2018是一个特殊的历史节点。波澜壮阔的中国改革开放迎来四十年。孔子曰:四十不惑,我们“不惑”了么?

思想界殚精竭虑,前绍后瞻、上下互鉴、左右腾挪、中外对比,滔滔雄辩与斐斐文采齐飞,真心帮忙与假意添乱一色。最震撼且最深刻的还是艺术。张继钢先生编导并上演千场的说唱剧《解放》,真真让观众耳目一新,脑洞大开、赞为观止!

一赞精彩历史概括力。“解放”一词是现代政治词汇,也是现代文化词汇。《解放》以沿袭千年的古代陋习——女子裹脚(也称缠足)喻女性之悲惨,以女性对裹脚的抵制象征几乎绝望的命运,说明女性身体与心理之如何痛苦、之如何应该改变、之又如何难以改变,揭示人类苦难的深层密码。“三寸金莲”始于何时何地难考,然雄才大略唐玄宗、亡国之君李煜皆有诗载,被誉为中国最优秀文人的苏东坡竟专咏之“纤妙说应难,须从掌上看看”,这实实在在地让我们愕然,对大人物的敬慕被打折扣。如此恶霸制度、如此恶劣文化、如此恶丑民俗,让堂堂文治武功浸泡于绝大多数女性的血泪!长长裹脚布,是千年女性的哭诉,更是千年男儿的耻辱。以裹脚概括历史,一叶寒秋,痛哉!

二赞精湛艺术表现力。现代婴儿出生,医院设计各种迎新仪式,其中之一就是将新生儿小脚丫复制,这与第一声呐喊同样珍贵。《解放》中有一段女孩儿天足的舞蹈,一大群女孩子通过“炫足”彰显蓬勃生机,活力四射,美不胜收,绿茵茵一片“天足”,活泼青春经演员“足舞”奔腾释放,观众感受欢愉与灵动。剧终则以大红绸布隆重象征解除裹脚的热烈,那确实是脚的解放,身体的解放,不才如我,亦能感受到生命之美、解放之善!这两段舞蹈必将经典,与用脚尖说话的“天鹅湖”异曲同工。

三赞精深哲学穿透力。一千多年,江山不断易主,你方唱罢我登场,为什么裹脚愈演愈烈,令人百思难解。官宦富贾、贩夫走卒,怎么大家都那么狠心,莫非父母皆铁石心肠?吊诡的是,从来崇尚皇权的前人,竟对明代开国君主朱元璋皇后绰号“马大脚”肆意贬损。清朝武力强迫汉族男性剃发、禁止汉族女性缠足,以为臣服之象征,孝庄太后谕旨:“有以缠足女子人官者,斩!”顺治帝严令“抗旨缠足者,其夫或父杖八十,流三千里”,无奈汉族知识分子拼死抵抗,最后以“男降女不降”保留这一“文化精粹”,本来可以提前三百年解除的灾难该死而未死,这是不是更深刻的阿Q精神?风气足以潜移默化统治者,虽然清廷厌恶,满族女子却也向往缠足,据说花盆底鞋(旗鞋)即由效仿缠足而成。

《解放》设计一个深刻情节,剧中女主角小小渐渐,担心自己的天足会让回乡的心上人亮亮难堪,于是要求裹脚,几句对话让人落泪。她婉劝:咱不裹,行不?小小不容置疑:不行!她婉阻:亮亮不嫌。小小斩钉截铁:我嫌!此情节堪称绝唱,我们是不是都有类似的心理或社会体验,明明知道某种做法荒谬,为从众只好委屈自己,这正是中国传统包含的某种落后与可恶!鲁迅早就斥责:从来如此就对了!如今口号声声复兴国学的人们,请慎而思之。观剧,何尝不是观自己的内心:我们心中是不是也有一双裹过的小脚!

四十年改革开放,开拓中国从未有过的壮阔。我们最大的财富是对世界与未来的认知。马克思说过,每一次革命都是把人的世界与人的关系还给自己。我们的改革不是从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”起步吗?我们不是要“不忘初心”么?而这一切就是靠自己的脚步,就是永远保持一双“天足”,何其难也,何其高哉!

观剧归来,涂鸦如上,有识之士何以教我?



大型说唱剧《解放》剧照

千山万水依旧『天足』

——说唱剧《解放》赞

■刘洪海

西洋镜

3D 打印仿肉食品亮相西班牙

最近,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一家餐厅的菜单上,出现了两道特殊的菜肴——3D打印素牛排和鸡肉。做出这两道菜的人不是厨师,而是意大利科学家 Giuseppe Scionti。不过这位科学家承认,目前这些3D打印食品的卖相还有待改进。



真实鸡肉(左)和3D打印的鸡肉(右)

这两种有肉类质感的食品,原料其实是从大米和豌豆中提取的蛋白粉和海藻成分。Scionti先用计算机设计出食品制作程序,然后用注射器将原料注入3D打印机,将原料拉成长丝状物,再压制成牛排状。利用这种方式,制作者可以在30~50分钟内生产出0.25磅素食牛排。鸡肉替代品也是用3D打印机生产的。

Scionti在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理工大学研发出了这款3D打印机,用它来生产仿肉食品的目的是减少肉类生产对环境的破坏。

Scionti表示,他已经开始与一些餐馆老板商谈出售这类素食食品的事宜,厨师们表示“对这种看起来像牛排但吃起来像蘑菇的食物很感兴趣”。“我们也和很多记者一起吃过这种牛排,他们认为这种以植物为原料的食品拥有肉类一样的质感。”Scionti说,“过去几年,研究者已经研制出了具有肉味的素食食品,我们的挑战在于模仿出肉类的厚重质感。”这位来自米兰

的科学家说,他的最终目标是降低牲畜饲养产生的温室气体,它们占据了人类产生的温室气体总排放量的14.5%。

不过,Scionti承认,这种素食牛排和鸡肉还需进一步改进,才能看起来更像餐厅菜单上的普通菜品。“我们会投入时间研发新技术来改善牛排的外观,对于消费者来说,食品的卖相是非常重要的。”当这种3D打印仿肉食品能够大规模生产后,其制作所需的成本和时间都会下降。

“这种假牛排非常容易煎制。它们不容易烧焦,也不粘锅。”加泰罗尼亚理工大学的一名厨师给出评价说。

荷兰禁止人们骑车时用手机



荷兰自行车

在荷兰,自行车的数量比人口数量还多。近四分之一的荷兰人每天骑车,骑车者年均出行250~300次。如今,智能手机时代的到来给爱骑车的荷兰人带来了新的烦恼——骑车时使用手机造成的事故与日俱增。于是荷兰政府决定颁布一条禁令,禁止人们在骑自行车时使用手机。

早在2002年,荷兰就出台过禁令,禁止轿车和货车司机驾驶途中在非免提状态下使用手机。此次计划起草的法律会将此规定拓展为禁止“在行驶任何交通工具(包括自行车)时使用移动电话设备”。

荷兰交通部长 Cora van Nieuwenhuizen 表

示,这个法律的出台是非常必要的,因为随着社交媒体和无限移动数据时代的到来,人们使用智能手机的方式和花费的时间都已经改变。

由于骑自行车的速度相对较慢,所以 Van Nieuwenhuizen 表示,最初的禁令并不包括自行车。“但事实上,骑车时使用手机与开车时使用一样危险。”她说,“一旦你来到马路上,就需要集中全部注意力,不要做任何与手机有关的事情。”

此前有调查显示,因骑车时使用手机造成严重事故并不多,但轻微事故数量正在增加,肇事者尤以年轻人居多。去年,在12岁~25岁人群发生的自行车事故中,有五分之一与使用智能手机有关。荷兰中央统计局的数据显示,2017年共有206名骑车者在交通事故中丧生,比2016年多了17人。

民意调查结果显示,75%的荷兰人认为在骑车时“活跃使用”手机,包括打电话、发短信、玩游戏、下载音乐、更新社交媒体状态或使用其他App,都应归为违法。多数受访者称自己亲眼目睹过有人骑车时使用智能手机而发生“险情”。

不仅是骑车者,行人在道路上使用手机也有造成自行车事故的风险。所以从去年起,荷兰小镇 Bodegraven 开始试用放置在地面上的交通灯,以防人们因沉迷手机而不小心走到马路或自行车道上。

(艾林整理)